

生产条件的跃迁与生产方式的演化

——迈向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刘 越 王小军

【摘 要】生产方式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话题,其含义众说纷纭。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一定物质技术基础上,以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的组织形式为核心,着眼于在社会范围内利用生产条件的方式方法。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在利用现有生产方式所提供的生产条件,即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基础上,通过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劳动的社会化改造,即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杂化的动力机制,实现特殊生产条件的形成进而一般化,亦即构建一般生产条件的过程。因此,生产条件的改变是生产方式演化与变革的路径,自在的生产条件跃迁至自为的生产条件,将促进生产方式的演化。也因此,作为生产方式变革的外在表现,共同富裕的实现也要充分利用自在的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充分调动简单物化与社会杂化的动力机制。坚持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与新型举国体制,加速特殊生产条件的进一步形成与一般化,迈向生产方式进一步社会化变革的共同富裕。

【关键词】生产方式;生产条件;自在与自为;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刘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小军(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青海社会科学》(西宁),2022.3.97~106,116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关于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主要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范式^{[1]219}、生产关系范式^[2]、技术决定范式^{[3]560}、劳动过程范式^[4]以及社会形态范式^{[5]413}共五类分析范式的研究,目前尚未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对于理论范畴的阐述和展开往往采用解释性而非定义性的原则,这在以其《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资本”“商品”和“剩余价值”等相关理论范畴的叙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学术界往往基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习惯而易于采用定义性的原则,对理论范畴进行界定,以致不同学者的研究可能都只观察到马克思关于特定范畴展开研究的一个侧面。由此,学术界对于同一理论范畴含义的众说纷纭,实际上可能相互并不矛盾、都没有错,只是面对不同实际问题时可能要注意各自强调的侧面有

所不同,都可能不尽完善。进一步考察,关于生产方式的形成原因,马克思也历史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历史的并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的有限发展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6]462}。可见生产条件的分析对于理解生产方式的含义与演化具有基础性作用,从生产条件及其变化出发去考察生产方式的实现路径,对于研究以共同富裕为典型代表的现实经济问题,将可能是一条相对切实可行的研究路线。

党中央提出共同富裕以来^[7-8],学界大致形成四种观点。其一,所有制论,强调要扩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乃至比重^[9-10]。尽管国有经济是全民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但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富裕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问题,也与“两个毫不动摇”^[11]的精神难以圆融。其二,初次分配论,强调企业要提高劳

劳动者收入在企业支出结构中的比重,这也似乎是更为普遍的观点^[12-14]。然而,当前的事实是,企业的利润率并不高,如果提升工资则有可能造成更大程度的利润挤压,进一步减少投资缩小规模,从而可能波及就业稳定。以2019年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14.75%是亏损的,建筑业平均利润率不足10%^①。可见,通过初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尚有一定的难度。其三,再分配论,强调寄希望于二次与三次分配的协调作用^[15-16]。然而这一观点的局限性在于,忽视了现有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的现状,即二次与三次分配的比重极低。同样以2019年为例,我国国家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29379.08亿元,占GDP的比重仅为2.57%,占财政总收入的12.30%;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外的省区市社会捐赠总额为1509.44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仅为0.15%,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0.79%^②。可见,通过再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尚需要更进一步的制度设计与政策落实。其四,教育富裕论,强调通过延长义务教育的年份以及更高学龄层次的扩招提升个人竞争力^[17-18]。虽然教育对个人实现富裕的作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相对明显,但全社会范围内教育层次的普遍提升,会使得把教育作为分配的手段去改观整体富裕程度的效果着实有限。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从个人奋斗^[19]或具体行业^[20]等更多角度出发讨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也具有与上述观点相似的局限性,不作赘述。可以看到,目前主要的共同富裕实现逻辑的观点,集中于强调分配结构的重要性。然而,殊不知分配行为是根植于生产活动的,如果不从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的讨论入手,尤其是不从生产条件的分配入手,那么对共同富裕的分配讨论就显得无的放矢。

共同富裕是历史范畴^[21],其本质是朝向高度社会化生产方式方向的演化与变革。生产方式变革需要其技术基础的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为价值生产的爆发与社会财富的陡增^[22],这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随着技术基础的革新,劳动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使得参与直接生产过程的管理者与劳动者获得了能够参与新一轮价值分配的可能^{[23]313-314}。当生产方式变革的成果从个别生产组织向社会空间扩散,社会范围内的非价值生产者也可能逐步具有参

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权力^{[24]6},社会财富也将以建成环境与地理景观^{[25]85}等具体的“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生产过程的这些条件”^{[26]522},亦即一般生产条件^{[26]529}的形式沉淀在社会空间内,使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巩固。当相当比重的社会财富以生产条件的形式,能够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循环所使用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社会经济主体就能够通过使用一般生产条件而减少劳动力再生产与直接生产过程的成本^[27]。一般生产条件就能够成为社会收入分配的缓冲器,其覆盖越广泛,社会公众能够受益的程度就越发充分,进而促进橄榄型的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格局^{[28]13}的形成。而收入差距作为共同富裕的主要挑战,就是由于特殊生产条件^{[5]614}的一般性不足导致的,即处于直接生产过程内部的优势性特殊生产条件的一般化乃至社会化的路径受阻,使得社会共同体无法普遍享有。因此,促进特殊生产条件的形成对于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然而更为重要的特殊生产条件的一般化,即构建“不同于特殊生产条件的一般生产条件”^{[29]254}则是迈向共同富裕的核心。

由此,本文将从生产方式的含义出发,探究生产条件的跃迁对生产方式演化与变革的影响。挖掘生产条件形成的动力机制,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一个生产条件决定生产方式的分析框架^{[6]462},并尝试借此揭示新时代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生产方式逻辑。

二、生产方式的三重含义

生产方式实际上包括技术、劳动过程和社会空间三重含义。这一观点大卫·哈维曾经也隐晦地提到过,“马克思本人对‘生产方式’这个术语有三种相当不同的用法”,其一是“在生产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时所使用的实际的方法和工艺”,其二是“劳动过程在……阶级关系当中特有的形式”,其三是“形形色色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再加上制度的、司法的和行政的安排、政治组织与国家机器、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再生产(阶级再生产)的特殊形式”。^{[30]77}不得不说,这已经与马克思所分析的技术、劳动过程和社会空间三重含义十分贴近,然而其仅在脚注中提及并未展开,且对于社会形态的空间含义的认识也尚未充分,但至少其启示本文应当整合地看待与

梳理生产方式的含义。

最为基础地,生产方式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基础上。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合适的技术基础”^[13]。因此,劳动资料作为物质基础的核心内容,是生产方式的指示器和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信号。也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改变他的劳动资料或他的劳动方法,或不同时改变这二者,就不能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也因此,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13]366}。所以,以劳动资料为核心的物质技术基础,对于生产方式的内涵塑造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这也直接引发了对生产方式的更高层次的含义的讨论。

相对核心地,生产方式也是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的组织形式。例如马克思就指出,(奴隶制)“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13]229},以较低水平的物质技术基础组织起来的劳动过程及其组织形式,其生产方式的落后性不言自明。而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过程组织形成,则“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13]326},因而取得了更为高效率的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推而广之,一般地来看,“不管这种生产方式的已经改变了的形式如何,这种形式作为一般劳动过程,即作为抽掉了历史规定性的劳动过程,总是包含一般劳动过程的一般要素”^{[16]103}。也就是说,劳动过程抑或是直接生产过程^③,作为生产方式的核心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微观基础。

一般意义上,生产方式最终着眼于社会范围内利用和组织生产条件的方式方法。直观地看,劳动者或直接生产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社会范围内的生产方式中去,亦即“生产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13]1147}。并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

关系”^{[13]1222},生产方式在社会空间内的意义逐步凸显出来。逐渐地,针对具有特殊性的这一社会化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132]409},将社会范围内的尽可能多的劳动者纳入这一生产方式体系。如果历史地考察生产方式的社会性,可以看到“小生产是社会生产的技艺养成所,是培养劳动者的手工艺、发明技巧和自由个性的学校”^{[13]3825},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6]153-154},且其“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14]127},社会空间范围内的生产条件也都由此得到了组织与利用,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表现出了一个质的飞跃。

因此,归结起来,生产方式应当是建立在一定物质技术基础上,以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的组织形式为重要内容,着眼于在社会范围内利用生产条件的方式方法——生产方式具有技术、劳动过程和社会空间三重含义。

生产方式虽然具有三重含义,但却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范畴。具体来看,生产方式变革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技术进步、劳动组织跃迁,进而使得在社会范围内利用生产条件的方式方法更有效率的历史进程。因此,从三重含义的视角出发,生产方式变革是一种齐头并进或齐头渐进的历史进程,一种含义的尤其是具有基础性的技术,其单独演进不足以推进生产方式变革,如果其不能够引发另外两重含义的演进和跃升,那么生产方式也就难以发生变革。

也正如前所述,生产条件是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路径,从生产方式的重重含义出发考察,技术、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与促进流通过程降低和流通时间缩短的社会因素都足以成为生产条件。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而相应改变,一定的生产方式需要与一定的生产条件相适应。

三、特殊生产条件和一般生产条件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生产条件分为特殊生产条件和一般生产条件,这是经过人类社会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劳动的改造以促进生产方式变革推进的路

径,这是后天的、自为的生产条件,不是先天的、自在的生产条件。

对于(特殊)生产条件的分析,马克思以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例,强调“单个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特殊条件^④必然分为三类。有一类人是在中等条件下进行生产;这就是说,他们进行生产的个别生产条件同这个领域的一般生产条件一致。平均条件就是他们的实际条件。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处于平均水平……第二类人进行生产的条件比平均条件好。他们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同种商品的一般价值。如果他们按这种一般价值出卖自己的商品,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商品卖得高于它们的个别价值。最后,第三类人是在低于平均生产条件的条件下进行生产。”^{[35]226}

可以看到,第二类生产者具有利好生产的特殊生产条件,其表现为劳动资料的物质技术基础所塑造的具有原发或后发优势的劳动生产率,其亦是较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而第三类生产者就截然相反,根本达不到一般生产条件,抑或是其自身的生产条件只是落后的历史时期的一般生产条件,总之其未取得利好生产的特殊生产条件,在生产条件上的落后性决定了其如果不能努力取得一般生产条件乃至特殊生产条件,就有可能退出经济竞争。

第二类生产者能够先期在社会范围内普遍地、成熟地、充分地利用一般生产条件于个别生产者的生产(劳动)过程并促进社会总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流通过程。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般生产条件如果“要由资本而不是由代表共同体本身的政府来兴建,那就首先要求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有极高的发展”^{[26]529}。这是一类特殊生产条件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扩散的过程。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生产条件可以成为其后的新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一般生产条件,而一定阶段的一般生产条件一定是其历史时期的特殊生产条件不断地成熟、扩张与广泛应用的产物。特殊生产条件的一般化过程形成了一般生产条件,进而其一般性和普遍性使其存在表现为公共工程的可能。虽然公共工程天然就具有一般生产条件的特性,但一般生产条件并非都是公共工程。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公共工程

摆脱国家而转入由资本本身经营的工程领域,表明现实的共同体在资本形式下成长的程度”^{[26]529}。但公共工程由个别资本来承担十分困难,因为其“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26]529},这是因为其已经在社会范围内相对成熟,已经几乎不存在获取超额利润甚至是一般利润的特殊性。但由于公共工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别资本得以完成其生产过程实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需要,这一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公共工程会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平均地进入众多个别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及服务于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因而这些生产条件非构建不可。所以,“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由于传统而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决心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26]529}。所以“这些工程同时又表现为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26]529},具体而言,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普遍存在的道路和运河^{[26]52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及其以后的水利工程、核电站和海底光缆等都是如此。

特殊生产条件和一般生产条件的变化,对于生产方式变革起到决定性作用。小范围的个别生产者拥有的特殊生产条件代表了一定历史时期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其涵盖的先进生产力具有向更广阔的社会范围扩散的可能,以形成新的一般生产条件。而一般生产条件的形成标志着某种技术或某种劳动组织形式及其物化的公共工程在社会范围内的普遍使用。这对于社会面貌的改变是直观的和根本性的,尤其是表现为公共工程的一般生产条件的形成,直接推进社会范围内利用生产条件的方式方法发生变化。

当然,一般生产条件的滞后化会使其缩小作用范围,退化为较落后的生产条件,进而被新的先进的特殊生产条件一般化而来的新的一般生产条件所取代。旧有的一般生产条件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旧有的生产方式也就随之逐步退场。可以看到,生产方式变革肇始于一种新的特殊生产条件的形成,成熟于特殊生产条件的一般化,因而旧有的一般生产

条件也就随之滞后化,亦即生产条件变化则生产方式也就随之变化。由此,回到源问题,促进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生产条件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动力源泉是什么,这将对于考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也凸显了实现生产条件本身从自在到自为^{[36][37]}的跃升以实现生产方式变革问题的重要性。

四、生产条件从自在到自为的跃迁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动力及基础

特殊生产条件是作用于单个生产者或生产组织的先进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具有现实的载体,这种载体可以是具有娴熟技能和先进知识与技术的劳动者,也可以是帮助劳动者实现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资料。可见,特殊生产条件的形成,契合了人作为生产的执行者或组织者期待通过付出更少的劳动以取得更多的产出的本能期待。假定在前资本主义的强迫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劳动不存在的条件下,通过劳动者自身条件的改善实现生产力的提升以及特殊生产条件的形成是做不到的,改善劳动资料是唯一的途径,“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2]10}。

人类的本能具有理性和自利性^[34],期待更少的劳动投入和更多的使用价值产出并存,甚至期待不劳而获,即把自身的思想和技巧物化在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中,进而促进自身的劳动强度下降或劳动执行更加简单。恩格斯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8]759}。当第一个古猿在繁劳地捕食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过程中发现,持续使用敲碎后尖利的石块去撕裂兽皮会比自己徒手操作更加省力且更有效率的时候,作为动物的古猿就转化成为旧石器生产方式下的原始人,他的思想和技巧就融入到这块简单的石头上,打制石器就成为最简单的劳动资料,当这一原始人优先于其他的古猿掌握了打制石器的制作和使用的时候,他就可能成为特殊生产条件的拥有者。可以看到,以物质技术为集

中表现的特殊生产条件的最初形成,一定来自劳动者将自己的思想和技巧凝固在生产工具或劳动资料中以减少自身劳动的过程,本文称其为劳动的简单物化。

人类的本能具有群性和利他性,抑或是同情心^{[39]5},即通过在人与人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与他人劳动合作与交换实现自身与他人共同的使用价值的增加。显然,个别的单独生产者掌握的先进的技术或技巧,不足以形成生产力,即使是形成特殊生产条件,也需要在相对小的范围内形成一定的应用规模,形成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力必然是社会的生产力,因为一种技术和技巧如果不能够或小或大范围地社会化,那么就会被淹没在历史中无法形成新的生产力。原始人掌握的打制石器技术被其同类模仿、习得或独立发现后,就得以形成在一定的社会空间范围内使用的劳动生产力,当形成小范围的特殊生产条件后,其一般化以形成一般生产条件就成为可能,人类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演化就开始了。可以看到,特殊生产条件的形成,要经历劳动过程中一定的技术或技巧在社会空间范围内的重新排布和促进生产活动的主观力量的分享,本文称其为劳动的社会杂化^⑤。

特殊生产条件作为自为的生产条件,其形成经过了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杂化的动力推进。原发性生产力,从青铜或铁器的使用,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诞生,乃至珍妮纺纱机和蒸汽动力的出现,都是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杂化推动的产物。但每一次生产方式演化的历史进程绝不是独立推进的,每一波的生产方式的演化都建立在现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基础也作为生产条件而存在,这种生产条件可分为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生产的社会条件^{[40]159}。

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建立在原始磨制石器生产方式已然成熟的基础上,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分别建立在奴隶和封建生产方式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这一逻辑已有充分的历史事实予以证明。特别地,原始旧石器社会生产方式的确立,也建立在一定的既有生产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即如果没有普遍存

在且具有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作为生产的技术条件,以及人与人初步地由于抵御天敌和灾害的需要而群居结成的原始社会关系作为生产的社会条件,那么特殊生产条件的形成并推进人类经济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化就无从谈起^{[13]388}。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正是由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杂化被十分突出地激活带来的,但其简单物化的来源是资本家努力通过将工人的劳动技能物化在固定资本中,便于管理工人反抗的同时^{[41]79}以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减少必要劳动但增加剩余劳动供资本家剥削。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形成,劳动的社会杂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充分适应且频繁发动生产方式变革的动力,使其创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剧烈推进了生产条件改变和生产方式变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润仿佛成为生产条件形成和生产演化的不竭动力,但更具本质性的逻辑则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激发了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杂化,并且资本家在利润的驱使下对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杂化的诱导力度和频率相对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空前激烈。要注意的是,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同特殊生产条件和一般生产条件的区别在于,前两者是在旧有生产方式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42]20},对于可能推进新的特殊生产条件的劳动者及其活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杂化的动力机制而言,这是客观的、可以利用的生产条件,未加活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杂化的改造,不足以形成特殊生产条件和一般生产条件。也就是说,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是一种自在的生产条件,区别于作为自为的生产条件的特殊生产条件和一般生产条件。从自在的生产条件转向自为的生产条件实现跃迁并推动生产方式变革,需要活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杂化居中改造与助推。

可以看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取决于生产条件的改变,生产条件的变化取决于所处的生产方式下自在的生产条件基础与人类本能和人的劳动的推动,所以生产方式演化变革确实是一个内生于人的本性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

杂化,是推动(特殊)生产条件形成的动力,更成为生产方式演化与变革的动力。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作为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加之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杂化的动力作用,导致特殊生产条件的形成与一般化,进而变革生产方式,也就相应集中地体现在其技术、劳动过程和社会空间的三重含义变化上。

归结起来,如果人的自利性仅限于劳动的简单物化,以萌发新的技术和技能,那么生产方式演进可期;如果人的自利性出于减少自身劳动但增加使用价值的需要而采用其他的手段,例如通过暴力或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占有他人的劳动或生产条件,乃至实现不劳而获,那么阶级与斗争就随之产生。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是人的自利性超出其应当发挥作用的空間,即不专注于劳动的简单物化转而剥削他人劳动的结果。通过扩展人的利他性发挥作用的空間,以及对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微调,以遏制人的自利性无限扩张,就有可能加速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进程,甚至跨越剥削生产方式的“卡夫丁峡谷”^{[42]465}。革命与改革就是改变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即生产的社会条件或技术条件的重要渠道。由此,生产方式的含义与生产条件的内涵及其动力机制如图1所示。

五、现有条件下推进共同富裕的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逻辑

至此,本文已经提炼完毕一个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条件跃迁决定生产方式变革的分析框架,这可能会对解释新时代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经济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帮助。归结起来,迈向共同富裕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特殊生产条件进一步形成的困难,主要体现为高新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43]。即使中国的社会再生产能力足以创造并尽可能实现价值,但技术作为生产方式的基础,也是驱动价值生产的重要燃料。另一方面,特殊生产条件的一般化,即一般生产条件的构建挑战,主要体现为目前全国范围内生产条件的分配不均^[44],使得生产条件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进而成为共同富裕实现的生产条件障碍。

事实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两大“中国经济奇迹”^{[45]2},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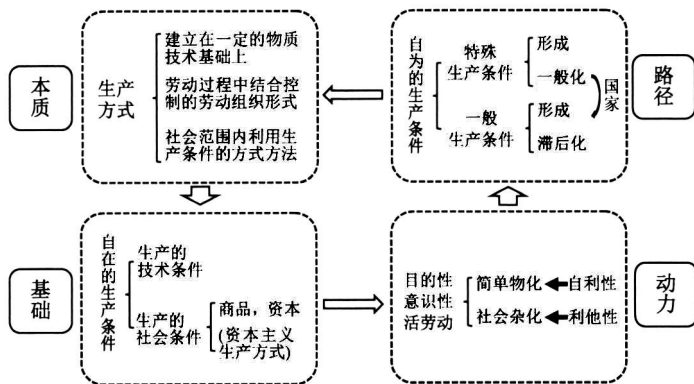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方式的含义与生产条件的内涵及其动力机制

全国人民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就是遵循了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的基本逻辑:一方面,通过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改革的效率增进^[46],实现了中国的特殊生产条件的革命性跨越;另一方面,通过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举国体制,推进了特殊生产条件的一般化,进而构建了庞大的一般生产条件网络。

从生产条件形成并迈向新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效率增进,是实现脱贫攻坚与迈向共同富裕的动力源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总过程运行的必备环节^{[26]22-41},而作为劳动者的人是完成生产环节的核心^{[41]42}。以增殖性资本为本质的现代企业作为生产组织,是实现生产环节的主体。社会再生产中的交换环节就是以生产组织为依托,实现生产组织与生产组织或生产组织与人的物质与信息交互,而市场就作为交换的一种有效机制在发挥作用^{[47]290}。市场作为一种网络化交换机制^[48],能够通过充分的物质与信息交互,使得具有进步性的劳动的简单物化成果能够脱颖而出,发挥筛选信息的功能^{[49]95},进而选拔最优特殊生产条件。但市场作为一种生产的社会条件,作为一种自在的生产条件,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地上本身就并不成规模地存在。

作为市场的建构者,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具有塑造自在的生产条件、为生产方式变革提供基础的重要作用,从而能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发动生产方式变革的动力机制^[50]。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中的人转化为劳动力从而具有了商品形

式^{[34]134},人能够作为具有资本形式的生产组织的核心充分嵌入直接生产过程,劳动的简单物化以生产组织为场所,使创造财富与技术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市场作为一种网络化的社会交换机制,具有熵增的特性^{[51]64},人的简单物化的成果就具有了能够在社会共同体内部流转而有序排布的可能,从而实现劳动的社会杂化。所以,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效率增进的制度安排,能够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动力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基础。这也为以产业脱贫为核心的脱贫攻坚^{[52]4}提供了良好的发育场所,为其实现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与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条件,也成为在新发展格局下迈向共同富裕的全国统一大市场^[53]的保障。

从利用生产条件而变革实现新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的一般生产条件构建,是实现脱贫攻坚与迈向共同富裕的跃迁路径。特殊生产条件的出现是生产方式变革的曙光,新的价值来源也是社会财富得以支持共同富裕的起点。然而,从特殊生产条件到一般生产条件的跨越,若通过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自然演化,则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甚至也可能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无法出现。

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就以其科层制^{[54]46}的结构优势^[55],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调节与加速的依据。一方面,在重要的社会化特殊生产条件的攻关与一般化扩散方面,新型举国体制相比于市场机制具有力量集中的优势^[56]。国家作为社会共同体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总代表^{[36]61-63},具有能够利用其所处位

置汇集信息并影响调节生产组织与生产组织、生产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能力^{[57][272]}。而国家本身对于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经济剩余的合法抽取^{[58][137]},也为其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59][312]},以及特殊生产条件和一般生产条件的构建提供了物质基础。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就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里,继承了原有举国体制的优势^[60],在交通、能源与通讯领域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等方式形成了独具优势的特殊生产条件^[61],并在全中国范围内建构了保障资源能源安全、提速降费^{[62][187]}与时空压缩^{[63][324]}的一般生产条件网络,使得生产条件从自在到自为的跃迁大大提速。另一方面,在一般生产条件的全社会覆盖方面,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具备的优势。社会共同体内部劳动力再生产质量的整体提高^{[26][467]},是国家作为其总代表的重要任务与使命。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主体,即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生产组织,因其本身的增殖性和局限性而难以关注社会共同体的全面利益动态^{[26][523]},这就需要通过升维,以更高层级的国家组织去关注与实践社会再生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就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里,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十年里,充分利用科层制的结构优势,组织与协调现有经济剩余向更为贫困的地区注入一般生产条件与特殊生产条件^[64]。尤其是通过一般生产条件的输入,使贫困地区得以和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相联结,摆脱小生产方式固有的弊端,实现了生产条件在城市与农村地区、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地区的均衡化再分配^[44],脱贫攻坚工作也得以顺利完成。这也为社会化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进而为实现共同富裕铺平了跃迁路径。

六、结语与未来展望

生产方式具有技术、劳动过程与社会空间三重含义,而其变革有赖于生产条件的变化,具体而言即特殊生产条件的形成与一般化,进而实现一般生产条件的构建,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生产条件从自在到自为的跃迁。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也遵循着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的现实逻辑。在现有实现脱贫攻坚的条件下,迈向共同富裕的主要挑战在于特殊生产条件进一步形成与一般化的困难,而改革开放四十

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坚持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与新型举国体制,仍然是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因此,本文就新时代迈向共同富裕从其现实逻辑提出建议。

一方面,特殊生产条件的进一步形成至关重要,既要靠市场更要靠政府。在保障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第Ⅱ部类消费资料方面,更需要具有创新性与试探性的技术改进^{[49][95]}。要充分激发市场机制有助于劳动的简单物化与社会杂化实现的筛选性优势,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一步形成,着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顺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45][4]}。在确保社会再生产总过程运行的第Ⅰ部类生产资料方面,还需要党领导下的国有资本充分利用规模优势,利用现有特殊生产条件下成熟与稳定的技术与劳动组织形式,充分降低社会再生产运行的上游成本^[65],从而使得社会公有剩余能够为全国人民的社会共同体所共享^[64]。

另一方面,一般生产条件的构建与深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环节,这有赖于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继续发挥作用。要继续增加一般生产条件网络的深度与广度。在深度方面,要继续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特殊生产条件并促进其一般化^[66],构建能够更好地组织与协调社会再生产总过程数字化体系化的社会机器^{[67][112]}。在广度方面,要继续推动一般生产条件向国内欠发达地区转移与输入,构建农村地下管网等一大批经济基础设施^[68],推进中小城镇层面的郊区城市化^{[69][184]},为社会再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开拓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70][177]}。

生产力极大丰富^{[42][20]}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首要特征,也是政治经济学需要回应的重大关切。从生产方式变革的动力机制出发,在以劳动的简单物化和社会杂化为动力,自在的生产条件向自为的生产条件转化的历史跃迁进程中,人的本性佐之以人的活劳动,会推进生产方式不断向前演化或归化地变革。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实现之时,人的自利性定将会被充分地、界限分明地对应到劳动的简单物化之中,人的利他性进一步推动劳动的社会杂化,进而让生产力的社会共享程度极大提升。这也正是由共产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下人的思想觉悟与道德水

平所体现的,包括精神世界发展在内的全面发展^{[42][20]}的应有之义。人的本性存在决定着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劳动存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进步也将持续进行,即便是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状态下,生产方式也将沿着既有的机制继续演化。

注释:

①数据为本文作者依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数据资料自行整理得出。(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A0E0102&sj=2021)

②数据为本文作者依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数据资料自行整理得出。(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A080501&sj=2021)

③“劳动过程”与“直接生产过程”是同一范畴。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生产过程包括具体的劳动过程与抽象的价值增殖过程两个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左翼学者多采用“劳动过程”这一范畴进行现实问题的研究,而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中为了与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相区别,也多处使用“直接生产过程”的提法。

④马克思对于生产条件的表述是较为灵活的,其在不同场合提到“生产的特殊条件”和“特殊生产条件”抑或是“生产的一般条件”和“一般生产条件”,其所表达的实际内涵几乎一致,本文出于简洁的考虑,在行文中统一采用后者的表述,特此解释。

⑤杂化是一个化学概念,指在原子之间成键时由于电子能量分布不均,要重新排列以求稳定的一种轨道。这里提炼并应用这一概念的从不均匀状态而经排布到稳定状态的动态演化含义。

参考文献:

- [1]斯大林文集:1934-195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9.
- [2]吴宣恭.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J].当代经济研究,2013(3):1-10+93.
- [3]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4]高峰.论“生产方式”[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3(2):3-38.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7]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578.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69.

[9]上进.社会公有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手段——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再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1998(2):10-20.

[10]张景星,王婷.论实现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J].社会科学战线,2014(6):265-266.

[11]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8.

[12]蔡禾.共同富裕的兜底标准与底线公平[J].探索与争鸣,2021(11):18-20+177.

[13]于金富.缩小财富与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求解[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2):68-75+158.

[14]姚宇,刘振华,苗静云.新时代工资制度改革如何推进共同富裕? [J].上海经济研究,2022(3):48-62.

[15]席恒,余澍.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与推进路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2(2):65-73.

[16]李旭红.三次分配视角下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政策选择[J].税务研究,2021(11):14-17.

[17]袁志刚,阮梦婷,葛劲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共同富裕:教育视角[J].上海经济研究,2022(2):43-53.

[18]王华春.畅通社会性流动实现共同富裕[J].人民论坛,2022(7):68-70.

[19]陈东利.论共同富裕的志愿服务伦理实现路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147-154.

[20]李鹏,邓爱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分析[J].社会科学家,2022(2):37-41.

[21]李包庚,孔维洁.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J].国外社会科学,2022(1):4-12+195.

[22]高峰.论财富[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2):1-15.

[23]诺布尔.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M].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13-314.

[24]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M].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6.

[25]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M].陈静,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85.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37.

[28]赵海均.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13.

[2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五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54.

- [30]哈维.资本的限度[M].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77.
-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09.
-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34]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26.
-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67.
- [37]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4.
-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26.
- [39]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
- [40]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59.
- [41]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M].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
- [43]程恩富.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若干重点解析[J].当代经济研究,2021(1):8-10.
- [44]陈享光.从生产条件分配看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及调节政策[J].学习与探索,2011(1):132-134.
- [45]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
- [46]陈享光.中国经济转轨中效率增进的逻辑与路径[J].经济学动态,2009(1):14-20.
- [47]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高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90.
- [48]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王逸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13.
- [49]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邓正来,编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95.
- [50]孟捷.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家经济治理[J].理论月刊,2021(9):53-60.
- [51]张明.负熵与货币——经济学的重构[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64.
- [52]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4.
- [5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04-11(1).
- [54]布劳,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M].马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46.
- [55]曾宪奎.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新型举国体制探索[J].宁夏社会科学,2022(2):89-96.
- [56]何虎生.内涵、优势、意义:论新型举国体制的三个维度[J].人民论坛,2019(32):56-59.
- [57]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72.
- [58]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M].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37.
- [59]列宁全集:第6卷[M].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2.
- [60]包炜杰.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历史与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21(5):104-110.
- [61]武汉大学开放式创新研究课题组.开放式创新体系中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研究[J].经济纵横,2019(06):55-61.
- [62]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87.
- [63]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24.
- [64]陈享光.收入分配理论的迷思与构建——兼论剩余分享制度[J].社会科学战线,2021(12):33-40.
- [65]谢富胜,王松.在协同竞争中推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J].教学与研究,2020(12):26-38.
- [66]黄泽清,陈享光.人工智能、社会权力与隐形就业[J].当代经济管理,2022,44(3):1-7.
- [67]亨德勒,穆维西尔.社会机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社会网络与人类的碰撞[M].王晓,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12.
- [68]谢富胜,高岭,谢佩瑜.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9,35(11):89-101+118.
- [69]佩蕾斯.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田方萌,胡叶青,刘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84.
- [70]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7.